非洲研究　2022 年第 1 卷（总第 18 卷）
第 129—142 页
SSAP ©，2022

她们仍在故事途中*

——布林克长篇小说中女性原型意象研究

张　甜　蔡圣勤

【内容提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于 1994 年土崩瓦解，给南非文学带来了自由，对南非著名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探索与审视那些被掩埋和被禁言的历史，叩问男性主导叙事下边缘化的女性的故事，试图用笔的力量，通过文学中的经典原型意象，重塑女性在南非历史中的存在，让她们从受支配地位变为故事的主体和叙事主体。本文试图以原型意象为经，以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为纬，借助希腊悲剧美狄亚杀子、法国英雄圣女贞德和《天方夜谭》里的故事高手舍赫拉查德三大原型意象，隐喻布林克后期的四部长篇小说《沙漠随想》《魔鬼山谷》《沉默的反面》《菲莉达》中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女性人物，揭露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治和性别政治驳杂的景深之下，女性悲惨的命运、遭受压迫后的奋起反抗和对主导命运的无限渴求，镜映出女性在南非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文化历史内涵和主导叙事欲望。

【关键词】安德烈·布林克；原型意象；女性人物

【作者简介】张甜，讲师，武汉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访问学者，从事南非英语小说研究（武汉，430212）；蔡圣勤，中南财经政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项目编号：19ZDA296）阶段性成果。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南非英语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武汉，430073）。

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1935—2015）是南非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并且在教育、人权、政治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南非是“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迪默和库切齐名的大作家”，① 曾三次入围曼布克奖短名单，三次荣获南非中央新闻社最高文学奖，也曾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和“法国荣誉骑士军团勋章”。布林克在一生的写作生涯中有三次转型，促成转型的转捩点分别是作家早年在巴黎的学习经历、南非政治环境的改变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吸纳，其中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是 1994 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这一政治境况的嬗变为其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自由气息，他终于可以摆脱政治束缚，开始毫无保留地涉足自己想要探索的主题。布林克承认，他对女性主义的解读，以及其妻作为女性主义者对他的影响，“让他意识到，在他最近的小说中对女性的塑造是在造访一个非常危险的领域”，② 因为他在写作后期开始探索与审视那些被掩埋和被禁言的历史，叩问男性主导叙事下边缘化的女性的故事，试图让女性从受支配地位变为故事的主体和叙事主体，揭示南非女性的历史之维。

一 布林克的女性书写

——原型之源

布林克生于南非北部自由省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治安法官，母亲是教师，深厚的家学渊源使他从小浸润在经典文学中。此外，父亲治安法官的工作让布林克很早就接触到了一些真实的社会事实，他回忆说：“大约从十岁时起，我常常偷偷地溜进法庭，坐到法庭后面，听父亲

① 周小青：《“岔路口”的抉择——安德烈·布林克文学创作的三次转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50 页。

② John Huggins，“What You Never Knew You Knew：An Interview with André Brink”，*Pretexts：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1999，8（1），pp. 7 – 15.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审理各种案件。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① 从童年开始，他对南非社会中白人虐待黑人的种族压迫和男性欺辱女性的性别压迫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少年时期，布林克读到了圣女贞德，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并在后来的写作中“将其写进了《沉默的反面》和其他多部作品”。② 青年时代，布林克曾留学法国，深受阿尔贝·加缪的影响，广泛阅读其文学和哲学作品，包括其关于“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的美狄亚。他后来在多部作品中书写了在极端情况下母亲杀子的情节，无不体现出与美狄亚杀子的关联性。

从法国归来，布林克出于一位作家和批评家的良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断用笔锋挑战南非普遍存在的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前，他的作品集中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强烈批判和跨越种族的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婚姻爱恋故事，触犯了当时南非种族隔离政府文字审查制度所禁忌的话题——性与政治。也正因如此，布林克曾遭受种族隔离政府的各种监视、威胁、恐吓甚至查抄。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回忆，布林克“有段时间，几乎天天得与出版审查机关交涉，人身也受到某种程度的迫害……他面对政府强权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正直操守，值得每一位知识分子学习”。③ 即使遭到迫害，布林克一直坚持驻守南非，在现场写作，显示出一位伟大作家的英雄气质和直言不讳的品性。他曾说：“除了种族压迫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在当今的南非，迫害妇女的事件无论是在黑人社区，还是在白人社区或者印度人社区，都还时有发生，这类事件从来就没有断过，而迫害的形式也五花八门。这使我始终难以释怀。”④ 1994 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土崩瓦解，这无疑成为布林克文学创作的转捩点。他的创作开始享受更多的自由气息，减少了宣传鼓动，开始“给人一种新鲜的历史感”，⑤ 开始探索与审视那些被掩埋和被禁言的历史，叩问男性主导叙事下边缘化

① 安德烈·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汪洪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序言，第 2 页。

② André Brink，*A Fork in the Road*，London：Harvil Secker，2009，p. 129.

③ 安德烈·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汪洪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序言，第 5 页。

④ 安德烈·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汪洪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序言，第 6 页。

⑤ 安德烈·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汪洪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序言，第 6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的女性的故事。本文研究的四部长篇小说《沙漠随想》（*Imaginings of Sand*，1996）、《魔鬼山谷》（*Devil's Valley*，1998）、《沉默的反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2002）、《菲莉达》（*Philida*，2012）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他试图通过写作，让女性从失语走向发声，从受支配地位变为故事的主体和叙事主体，以揭示南非女性在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澳大利亚著名的南非文学研究者苏·科苏（Sue Kossew）认为“有两个女性人物一直影响着布林克最近的创作——圣女贞德和舍赫拉查德。这两位女性分别代表了布林克写作的两个重要信条”。① 其一，圣女贞德展示了一位觉醒的女性拒绝被投入历史的垃圾桶的勇气和决心，拒绝成为无数被禁言的女性群体中的一个；其二，《天方夜谭》中的舍赫拉查德通过讲故事引起国王的兴趣来推迟死亡，他被迫不断允许她多活一天又一天。叙事是一种愈疗，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布林克作品中女性叙事者所述故事的嵌套结构特征和故事的疗愈功能，深刻体现了与舍赫拉查德这一原型的相关性。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在作品《批评的解剖》中表示，原型即“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或“联想群”。② 他在《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一文中指出：“我把原型看成是文学作品中的因素：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是一个可从范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③ 原型作为一种可独立交际的单位，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具有约定性和稳定性的结构因素，将孤立的作品相互联系起来，使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统一整合的意识形态。④ 布林克长期以来深受文学文艺经典影响，在后期的四部代表性长篇小说中，他以原型意象为经，以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为纬，借助希腊悲剧美狄亚杀子、法国英雄圣女贞德和《天方夜谭》里的故事高手舍赫拉查德三大原型意象，隐喻小说中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女性角色，揭露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治和性别政治驳杂的景深之下，女性悲惨的命运、遭受压迫后的奋起反抗和对主导命运的无限渴求，镜映出女性在南非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文化历史内涵和主导叙事欲望。

---

① Sue Kossew，“Giving Voice：Narrating Silence，History and Memory in André Brink's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and *Before I Forget*”，*Tydskrif vir Letterkunde*，2005，42（1），p. 135.

② 弗莱：《批评的解剖》，载《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 1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 231 页。

③ 转引自王世芸《关于神话原型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34 页。

④ 王世芸：《关于神话原型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34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二 悲怆的女性

——美狄亚杀子

1959—1961 年，布林克在法国索尔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读到了加缪的文字，并深受其影响。布林克曾多次公开表示加缪是他的人生导师。“对我的作品产生深远持久影响的正是阿尔贝·加缪”，[①]“加缪在情感和道德上彻底征服了我”。[②] 除了是荒诞哲学的创始人，加缪的小说、戏剧和随笔深受希腊神话中的悲剧人物“美狄亚”的影响，深刻地揭示了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美狄亚——由‘古代剧团’演出。听到这样的语言，我仿佛一个终于回到家乡的人，无法不流泪。这些就是我的话语，我的情感，我的信仰。‘一个没有城邦的人是何其不幸。’‘哦！别让我无城邦可归去。’”[③]“你怀着一个愤怒的灵魂，离家远航，穿过海上的岩礁，定居在异国的土地上。”[④] 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悲剧人物，她是忠诚的伴侣，也是被遗弃的妻子，是被迫杀子的母亲，是一个永远的边缘人。[⑤] 她被爱神之箭射中，爱上了伊阿宋，为了他背叛家族，背井离乡，并与伊阿宋生下两个孩子。为了爱情，美狄亚奉献了一切，而后伊阿宋却因权力和新的爱欲背叛了家庭，抛妻弃子，并配合新欢驱逐美狄亚和孩子们。受到伤害的美狄亚实施了死亡复仇，在绝望中杀死了孩子，造成了可怕的人伦悲剧。布林克在小说创作中潜入南非的历史深处，揭露了女性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历史境遇。他笔下有两位女性的命运与美狄亚如出一辙。第一位是《菲莉达》中的女主人公菲莉达，她是南非奴隶制后期（1833 年英国国会通过解放黑奴法令，南非作为英属殖民地也实施这一法令，所以南非奴隶制后期指的是临近

① 转引自蔡圣勤、张乔源《论布林克小说中的人性异化和逃离自由》，《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第 92 页。

② 转引自蔡圣勤、张乔源《论布林克小说中的人性异化和逃离自由》，《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第 92 页。

③ 阿尔贝·加缪：《加缪手记》（第 3 卷），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 43—44 页。

④ 阿尔贝·加缪：《蒂巴萨的婚礼》，郭宏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 132 页。

⑤ 黄凤祝：《美狄亚的愤怒》，《读书》2010 年第 7 期，第 115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1833 年的一段时间）赞第府列特庄园（Farm Zandvliet）的一名黑人女奴。在白人奴隶主的儿子弗朗斯的强迫和虚伪承诺下与之保持亲密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渐生情愫，并生下孩子。然而在弗朗斯父母的安排之下，他要迎娶一位有助于家族发展的富家千金。随后地狱模式开始，与美狄亚的命运一样，菲莉达受到驱逐，她必须消失，她的孩子更需要消失。

美狄亚杀害亲子，不仅仅是为了复仇，也是因为对孩子的未来感到绝望。美狄亚遭到驱逐，她所面临的命运是：一个异乡人，带着没有父亲的孩子漂泊无依，在那个遥远的父权时代背景下，这是怎样凄惨的生活？历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杀子案例，是二战期间德意志帝国的“模范母亲”玛格达·戈培尔，她的丈夫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希特勒自杀后，玛格达在柏林的地下堡垒中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最后与丈夫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后希特勒时代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中”。[①] 在布林克的小说里，菲莉达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她夺去了儿子的生命，是想让他免受黑人奴隶的命运——如狗畜般活着，生不如死地煎熬着。[②] 布林克另一部长篇小说《沙漠随想》中女主的姐姐安娜从美丽骄傲的“蓝花楹女王”，[③] 成为一个“满脸倦容、身材走样，身边围满孩子的中年妇女”。[④] 仔细梳理小说故事情节，可以发现安娜长期处在丈夫卡斯珀的压制下，他每天招摇过市，花天酒地，甚至骚扰安娜的妹妹，而安娜却要独自照顾五个孩子，像仆人一样伺候丈夫，还要忍受丈夫对她的鄙夷贬斥和家暴毒打，她俨然已成为沙文式夫妻关系的牺牲品。于安娜，丈夫的所作所为已经背叛了家庭，剪断了他们婚姻的纽带。她终日在动荡不安的南非社会和恶劣的家庭环境中忍受折磨，最后在一种白热化的撕裂状态中选择终结自己的家庭——杀死了孩子和丈夫，最后自杀。对于安娜而言，这也许是唯一获得解脱和自尊的方式。菲莉达和安娜最终走上绝路，犯下杀子的骇人罪行。她们是残暴的母亲，更是悲怆的母亲。也许我们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抨击她们丧尽天良、穷凶极恶，而通读小说后却发现，她们戕害幼子并不是出于天性的残暴，而是悲怆的母亲在绝境中做出的歇斯底里的选择。如果不是身处绝境，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在夹缝中活着，如果不是出自内心

① 黄凤祝：《美狄亚的愤怒》，《读书》2010 年第 7 期，第 113—114 页。

② André Brink, *Philida*, London: Vintage, 2012, p. 62.

③ André Brink, *Imaginings of San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6, p. 13.

④ André Brink, *Imaginings of San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6, p. 13.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的绝望与愤怒，没有一个母亲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所以，杀子悲剧不能完全归因于身处物质和精神困境的母亲，虚伪的社会道德和毫无责任心的父亲更是罪责难逃。

美狄亚之所以复杂，还在于她的边缘人身份。美狄亚是位于高加索和黑海东岸之间的科尔奇斯王国的公主，来自古希腊人所认为的东方蛮夷之地。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她是个永远的边缘人。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还是女性主义的文学解读，美狄亚都不曾拥有真正的话语权，也无法通过正常程序为自己申辩。婚后的安娜生活在丈夫卡斯珀的影子里，婚姻让她走下“蓝花楹女王”的神坛，退化成一个终日围绕丈夫和孩子的中年妇女。在妹妹克里斯汀的鼓舞下曾想提出离婚，但是因为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更没有话语权，她无法脱身。她既是婚姻的奴仆，也是永远的边缘人。赞第府列特庄园中的菲莉达，虽然生长于此，但她无法摆脱黑奴的身份，她的生活空间总是处在分裂的幻想和扭曲的现实之间，加速了她的身份焦虑，“我从来不是能决定去哪里，什么时候去的那个人，这总是取决于他们，总是取决于别人，而永远不是我”。[①] 她的使命就是按照主人的意愿去干活，任由主人对她做出一切行为。“我是一块编织物，由别人编织摆布着。”[②] 当菲莉达鼓起勇气，尝试去斯坦陵布什告发弗朗斯时，她的不幸遭遇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被主人反咬一口，诬陷她勾引主人，诬陷儿子并非她与弗朗斯所生。所有这些不公遭遇皆是因为菲莉达的黑人女奴的身份，“生而有罪”的黑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永远的边缘人，“第二性”的性别压迫更将菲莉达排除在主导叙事之外。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阴云密布，菲莉达遭遇了“交织性”[③] 的折磨，这是沉重的叠加压迫，她的自我意识遭受创伤和极度削减。

三　抗争的女性

——圣女贞德

布林克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也会在经受磨难之后，鼓起勇气，奋勇反

① André Brink, *Philida*, London: Vintage, 2012, p. 62.

② André Brink, *Philida*, London: Vintage, 2012, p. 65.

③ 朱云：《交织性》，《外国文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抗，这一形象塑造与布林克对圣女贞德的热爱是分不开的。圣女贞德是欧洲文学画廊中一位不可多得的女性英雄人物。从洛林的农村到与英国对峙的战场，她的身份随着空间的转移而变换：在洛林，她是普通的牧羊女；在法国皇宫，她是能言善辩的谏者；在抵御外敌的战场，她是保卫国家的勇士。贞德展示了一位觉醒的女性拒绝被投入历史的垃圾桶的勇气和决心，拒绝成为无数被禁言的女性群体中的一个。在西方文学众多女性原型中，圣女贞德特征鲜明，具有新女性的魄力，是勇敢、坚毅、反抗的代名词。从萧伯纳戏剧《圣女贞德》的第一场我们便知道贞德是崇尚自由、勇敢正义、追求平等且辩才无阂的女人。① 正因为这些品质，布林克不到 14 岁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他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关于贞德的文学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她的魄力。少年的布林克经常独自游荡于非洲大草原，对着树木爬虫讲述贞德的故事，并幻想它们的回复。② 圣女贞德填满了这位少年的睡梦，也将灵感注入了他的笔尖，极大地影响了他在种族隔离时期“反叛”的文学创作。

作为女性原型，圣女贞德成为文学创作者心中的镜与灯，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让他们有机会挪用经典的文学形象，并予以深度再创造。圣女贞德对布林克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其对众多女性人物的塑造上。《风中一瞬》中的伊丽莎白不甘困于家庭围栏内做“花瓶”，抵制父权家庭对女性的定义。她向往内陆的自由，力图挣脱父权制对女性身体和思想的束缚，与丈夫一起去南非内陆冒险。伊母对此的决定大为震惊：“一个男人去探险无可厚非……但是你，伊丽莎白，你习惯了得体的生活，你是有教养的，你是别人的榜样。”③ 这一情节对照了 2018 年布克奖获奖作品《送奶工》中女主的母亲对她说的话，“女人的命运是婚姻和做母亲，承担责任，忍受限制、局限和障碍”。④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⑤ 女性的生活空间受到挤压和封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文化规训的结果。在小说故事发生的历史语境下，从未有南非白人女性去内陆探险，而这却正是伊丽莎白心之所向，她最终顶住压力，毅然跳出了开普敦的舒适圈，踏上了前往南非内陆的历险

① 肖丽霞：《论贞德的身份演变及其政治困惑》，《文学教育》2013 年第 4 期，第 34 页。

② André Brink, *A Fork in the Road*, London: Harvil Secker, 2009, p. 129.

③ André Brink, *An Instant in the Wind*, Chicago: Sourcebooks Landmark, 2007, p. 38.

④ Anna Burns, *Milkman*, London: Faber, 2018, p. 50.

⑤ 波伏娃：《第二性》I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 9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征程，做了一般女性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一人物形象与在法庭接受审判的贞德有极大的关联性。当宗教法官指责贞德说她只不过是牧羊女时，她承认自己“和别人一样照顾过羊”，并且“在家会纺线或者织布”，[①]但她反对他们把她定位为一个只在家庭中做女红的女性，况且“这些事情已经有非常多的女人在做了，可是却没有人做过我做的事”。[②] 她曾穿着战袍，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这是她作为一个法国人（而不止是个女人）为国家而战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扩大了女性活动的领域，她铿锵有力的反驳像一道璀璨的光芒，照亮了压迫女性的黑暗。

《沉默的反面》里的汉娜是一位孤儿，幼时遭受了身体和心灵的摧残，成年后又沦为“父国的漂浮物”，[③] 被德国家政服务机构从汉堡运送到西南非洲（即今纳米比亚），给殖民地的男性们做新娘（这种毫无人性的家政服务从 1900 年一直持续到 1914 年）。汉娜在两方面遭遇到了暴力的禁言。首先，汉娜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备受欺凌，同时又极力反抗外界的欺压，被夺去了姓氏，成为汉娜·某某，被送上前往殖民地的船只，被排除在主导历史叙事之外。再者，汉娜不肯安静地顺从暴力侵犯，作为惩罚，她被残忍地拔掉了舌头。[④] 圣女贞德的原型不仅体现在布林克对汉娜的人物设计上，她对汉娜的影响也严丝合缝地嵌入汉娜的心理变化中。因为她相信自己与贞德之间存在“紧密的个人关系”。[⑤] 汉娜的老师告诉她，圣女贞德的历史影响力不仅在于“她做了别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更在于她“永远保持真我本色”。[⑥] 如此，圣女贞德以其骄傲和决心，以及鼓励他人思考和质疑的能力不断启发着汉娜，“去揭示我们不敢直视的黑暗地带”。[⑦] 汉娜想象圣女贞德以及她所代表的一切能量每时每刻萦绕在她身边，激励自己“采取新的策略将之前的失败转为成功”，[⑧] 这种精神张力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汉娜对德国士兵采取的复仇行动中，她无所畏惧，披荆斩棘，她成为圣女贞德，成为一位敢于掌握自己

① 萧伯纳：《圣女贞德》，房霞译，新星出版社，2013，第 105 页。

② 萧伯纳：《圣女贞德》，房霞译，新星出版社，2013，第 110 页。

③ André Brink,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London: Vintage, 2002, p. 12.

④ Sue Kossew, “Giving Voice: Narrating Silence, History and Memory in André Brink’s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and Before I Forget*”, *Tydskrif vir Letterkunde*, 2005, 42 (1), p. 137.

⑤ André Brink,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London: Vintage, 2002, p. 107.

⑥ André Brink,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London: Vintage, 2002, p. 66.

⑦ André Brink,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London: Vintage, 2002, p. 66.

⑧ André Brink,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London: Vintage, 2002, p. 121.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命运的战士。

圣女贞德不仅仅是布林克小说中众多女性人物的原型，更是其作品的整体结构叙事和创作行为的缩影。布林克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对殖民暴力的描写，反种族隔离的言论和对性的直言不讳，违反了严格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禁忌，得罪了南非民族主义政府，成为“阿非利卡民族的叛徒”，① 他的作品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合法”文学作品格格不入，因此他遭受了各种威胁、恐吓、监视甚至查抄。但无论在何种境遇下，他坚持驻守南非，不断挑战种族隔离制度和父权制度体系。所以，圣女贞德对布林克的影响没有止步于小说女性人物的塑造，他的整个创作行为也是“圣女贞德式”的。他认为在种族隔离制度和父权制织就的黑暗之网里，作家有责任拿起笔枪，对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进行揭示，反抗不公，弘扬正义。

四 女性的叙事欲望

——舍赫拉查德

库切曾指出，南非社会是一个崇拜男性上帝的父权社会，女性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是空白的。② 布林克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被主流叙事和宏大话语所遮蔽的女性故事，而这些被遮蔽的因素，恰恰成为一种更为真实的女性个体存在，她们的故事亟待被人听到。作为一位为边缘人群发声的良心作家，布林克试图将女性从受压迫到抗争的故事写下来，让女性跳出受害者的叙事框架，利用《天方夜谭》中舍赫拉查德故事嵌套结构特征和叙事疗愈功能，表达了女性成为主导叙事者的欲望。

舍赫拉查德是夏拉国王的新王后，是一位讲故事高手。夏拉国王因前王后的背叛，决定杀死每日新娶的女孩，直到聪慧的舍赫拉查德成为他的新娘，给他讲起了故事，并精妙地设置了故事悬念，让国王不舍杀死自己，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舍赫拉查德的故事治愈了夏拉国王的强迫症和他内心的伤痛（心灵紧缩症状），她自己也因此获得了生存的

① 周小青：《“岔路口”的抉择——安德烈·布林克文学创作的三次转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50 页。

② 黄晖、兰守亭：《库切小说中的疯癫叙事解读》，《当代文坛》2014 年第 3 期，第 76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机会。[①]

《沙漠随想》中克里斯汀家族中的女性是故事的叙述者，她们深刻了解女性在南非历史和现实中的窘境，决定用口头叙述的方式留下女性的故事。[②] 克里斯汀的祖母在南非全民大选之际的动乱中严重烧伤，年过期颐，却不肯离去。她并不是因为贪念人间，而是还未将家族女性故事传承下去，心愿未了、使命未结，怎能离去?[③] 叙事欲望让她选择坚持下去，等到克里斯汀从伦敦回到南非，祖母便在弥留的病床上，带着她开启了家族长河的寻根之旅。所以小说呈现出故事中的故事这一显著特征。嵌套内置式的故事保存着母性的想象力和生命力，具有创造性，属于人类精神的女性层面。克里斯汀的祖母试图以家族女性的故事作为良药，治愈克里斯汀幼时在南非遭受的伤害，让她重新接纳并留在了不完美的故土。这个情节也是布林克的自我投射：青年时代赴法国求学，其间南非隔离政府针对黑人的和平示威制造了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导致 70 多人被无辜杀害。这一事件给布林克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使他打消了学成回国的念头。[④] 但是暂居法国的布林克最终没有办法无视故土发生的暴力而置之不顾，于是本着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回到南非并坚持在现场写作，试图用故事，让自己，也让南非人有机会从伤痛累累的过往中走出来。

克里斯汀家族历代女性中有不少人具有匪夷所思的超能力，比如被视为异类遭到父母幽禁，却具有高超艺术禀赋的蕾切尔——祖母的母亲;[⑤] 具有惊人的语言天赋和超乎常人的预言能力的彼得罗内拉——祖母的祖母;[⑥] 还有更加遥远的祖先卡玛，可与鸟兽虫鱼交流无碍，可随意消失在沙漠之中。[⑦] 这些故事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阈限，将克里斯汀包裹进祖辈的经历中，向她提供进入时间本质的渠道，提供比现状更广阔的视野，让她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在南非的过去和南非作为一个国家的过去。作为讲述者，这也是祖母重温生活的最后机会，“而且是以创造性的方式

① 程晓琼主编《天方夜谭》，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第 9 页。

② André Brink，*Imaginings of San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p. 174.

③ André Brink，*Imaginings of San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p. 57.

④ 安德烈·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汪洪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序言，第 3 页。

⑤ André Brink，*Imaginings of San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p. 89.

⑥ André Brink，*Imaginings of San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p. 100.

⑦ André Brink，*Imaginings of San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p. 182.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重温过去的生活”，[①] 所以叙事对于祖母而言，既是愈疗，也是生存。当克里斯汀问起这些是故事还是历史的时候，祖母回答：“两者没有多大的不同。在你小的时候，你觉得是故事，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与历史）吻合了。我们总是在隐藏对不可能的事情的一种渴望。我、你，你妈妈，还有在我们之前的那些祖辈女性们。”[②] 这些故事不是无视历史事实的向壁虚构，而是布林克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在深刻了解南非历史中女性的处境与社会地位之后，艺术性地重构了凝固于集体历史记忆背后那些令人怦然心动和危机四伏的时刻。如库切所言，小说旨在“补充历史而不是与历史竞争”。[③] 一代又一代南非女性被卷入时代的洪荒，大多数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的记载。比如彼得罗内拉——克里斯汀祖母的祖母，曾参与南非的历史主线，在布尔人“大迁徙”中曾带领族人与敌人殊死搏斗，却没有被写进历史。“历史被掩盖、毁坏、模糊化或是被撕碎、被扭曲……我们想要重构我们的历史、发觉自我，以重新理解我们的遗产。”[④] 祖母试图用祖辈女性的故事与历史中男性主导叙事相互交织，填补历史的空白与沉默，也试图在重述历史时纠正性别不平等的过去，为那些终极沉默的她者（逝者）发声。对于她们而言，主导叙事等于主导命运。祖母在故事中告诉克里斯汀祖辈女性如何在更糟糕的生存环境中活出自己，教会她如何保持对过去的开放心态，如何去期待未来和未知，让她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也就为她向何而去指明了方向。家族的故事摘下克里斯汀戒备的面具，拂去了她心境的尘埃，使长期屈居于故土之外的她呈现在自由的阳光下。小说结尾，克里斯汀留在了南非，参与国民大选活动，用自己的行动继续书写家族女性的历史故事。

有学者认为，舍赫拉查德的故事是对当时僵化的社会和精神结构的一种反映，表达了对世俗束缚的狂欢式的颠覆。[⑤] 克里斯汀家族历代女性的叙事内容和行为、主导叙事的欲望均代表着一种僭越和颠覆，打破了

---

① 郝思特·孔伯格：《故事的力量》，薛跃文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第 290 页。

② André Brink，*Imaginings of San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p. 88.

③ Stephen R. Clingman，*The Novels of Nadine Gordimer*：*History from the Inside*，London：Unwin Hyman，1986，p. 2.

④ 罗良功等：《历史、声音、语言：泰辛巴·杰斯与张执浩论诗》，《外国语文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⑤ Eva Sallis，*Sheherazad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Richmond，Surrey：Curzon Press，1999，p. 24.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南非女性长期被禁言的历史现实，表达了她们主导叙事和主导命运的无限渴求。

在《沉默的反面》中，布林克试图用汉娜的故事进一步诠释叙事与治疗之间的联系。汉娜在去温特和克的火车上遭到德国军官暴力侵犯，被拔掉舌头和残暴殴打。幸运的是，她残缺的身体被非洲土著部落纳马族发现，并在他们的救治下奇迹般康复。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草药疗效，更是因为纳马族部落文化的传统故事。“日日夜夜，当她半睡半醒，晕眩昏迷时，这些故事像具有难以明喻的疗效作用的洪水和药膏，暗暗潜入她的身体”，“没有什么痛苦或邪恶是故事治愈不了的”。① 这种难以明喻的疗效作用存在于纳马部落对沙漠植物疗效的强大知识储备里，更存在于他们的口头文化和语言里，后者产生于非洲这片土地，而又让非洲的土地景观复活。土地与故事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当汉娜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时，她觉得脚下不是土地，而是“有灵魂的故事，有生命的隐藏着的存在，自然与超自然相互交替或同时进行”。② 汉娜通过纳马族的故事轻触着非洲这片土地，缓解了记忆和身体的创伤，这就是故事的意义。布林克对故事的疗愈效果这一主张也体现在文章《审问沉默：南非文学面临的新可能性》当中。他写道，“非洲有一种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可以向世界展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际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我认为，通过将世界视为一个有待讲述和不断重塑的故事，读者实际上被鼓励对这个世界采取行动……（所以）文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不是减弱”。③

结　语

布林克的女性书写并不是简单的对个别现象的揭示，而是南非女性集体的痛切陈情。南非女性，黑人、白人或有色人种，多数处于这个动乱的国家的最底端，她们身处于巨大的生活困境之中，镜映了最真实的

① André Brink,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London: Vintage, 2002, p. 94.

② André Brink,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London: Vintage, 2002, p. 56.

③ André Brink, “Interrogating Silence: New Possibilities Faced by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South Africa: Literature, Apartheid and Democracy, 1970 – 19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6.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历史现实。在“书写即匡正”（writing as righting）的文学武器的助益下，布林克以作家的敏感，透过语言和历史，以文学经典原型发现过去，为南非女性这一长期哑言的主体还原历史、修正历史、补充历史。布林克小说中的女性们幸存下来，成为叙述主体，并不意味着他所书写的世界中女性建构主体的胜利，也“不意味着小说以圆满和谐结尾，而是代表着新的、更有希望的起点，”① 其影响更是投射到了文本之外。尽管这些女性没有交集，却形成了一条女性命运的平行线，她们是受压迫的养育者，是悲伤的母亲；她们是勇敢的抗争者，是伟大的战士；她们是真诚的叙事者，是故事的主人。她们用自己独特的感悟力书写着南非女性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她们，仍在故事途中。

【责任编辑】杨惠

① 李元：《析安娜·伯恩斯小说〈送奶工〉中的后现代女性成长叙事》，《外国文学》2021 年第 1 期，第 23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They Are Still on the Way of Stories—A Study of Female Archetypal Images in Brink's Novels

Zhang Tian, *Cai Shengqin* / 129

Abstract: The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ended in 1994, which brought freedom to the literature of this country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the eminent writer, André Brink. He set out to explore and examine the buried and silenced history, revealing the stories of South African women who were marginalized by the male-dominated master narrative of history and strove to use the power of pen to reconstruct the existence of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rough classic archetypal images in literature, thus moving them from the subordinate position to the subject of stories and nar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Brink's later works: *Imaginings of Sand*, *Devil's Valley*,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Philida* in terms of the archetypal images of Medea, Joan of Arc and Scheherazade from *Arabian Nights*. Through the study of female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colors, cultur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racial and gender politics,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reveal women's tragic fate, courageous fight in oppression and infinite desire to dominate their fate, mirroring women'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desire of dominant narration in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context of South Africa.

Keywords: André Brink; Archetypal Images; Female Characters

A Study on Contact Situation between the New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Afric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tact Theory

Wen Guozhu / 143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tact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act situation between 30 new Chinese businessmen doing business in Africa since 1980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Africa.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new Chinese businessmen in Africa adopted the strategies of gradual contact,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